

“黄鱼圈珠山 M1”类型遗存再辨析

金旭东¹ 赵俊杰² 吕斌³

(1、2.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3.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春, 130000)

摘要: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重新界定了“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的内涵, 认为其时代可能约在战国晚期——西汉初期, 并描绘了这类遗存所代表人群的迁移路径。这支人群的迁移过程, 是落后的考古学文化与先进的考古学文化不断接触, 逐渐吸收先进文化因素的过程。

关键词: 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 筒腹陶器 战国晚期——西汉初期 迁移

目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 第二松花江流域的吉林、长春地区已知西团山文化之后存在的考古学遗存大体可分为五类, 分别为泡子沿类型、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邢家店类型、田家坨子类型与“汉陶”遗存^[1]。学界对于其中的泡子沿类型为夫余遗存, “汉陶”遗存为中原战国时期文化在吉长地区的延续已有共识, 对田家坨子类型与泡子沿类型之间存在的诸多共性亦无疑义。邢家店类型的性质问题虽悬而未决, 但遗存面貌自身特点明显。以上四类遗存分布较为集中, 唯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迄今发现的地点不多, 缺乏稳定的分布区域, 往往混杂于其他类型遗存的分布区内, 其文化内涵、时代与流变均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

一、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的内涵与界定

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以九台黄鱼圈珠山遗址 M1^[2]为代表, 乔梁初步界定了其文化特征, 指出这类遗存还包括九台关马山 M1, 石砬山上层墓葬^[3], 公主岭猴石古墓^[4], 主要文化特征为: “墓葬多以石质材料构筑。比较流行火葬和多人合葬习俗。用于随葬的陶器大多为制作简单, 形体较小的明器。陶器多为夹砂褐陶, 器表一般为素面。制法以手制为主, 小型器物往往采用直接捏制的方法。器形有罐、壶、杯、碗、豆等。其中以筒腹带瘤状耳的罐、杯类器物最为流行。除陶器外用一些石器与小型铜器随葬, 石器中以顶端穿孔或磨豁以便于系带的长条形砾石最富特色”^[5]。此外, 还根据主要文化因素的相似性将桦甸西荒山

发掘的 7 座青铜短剑墓^[6]也归入此类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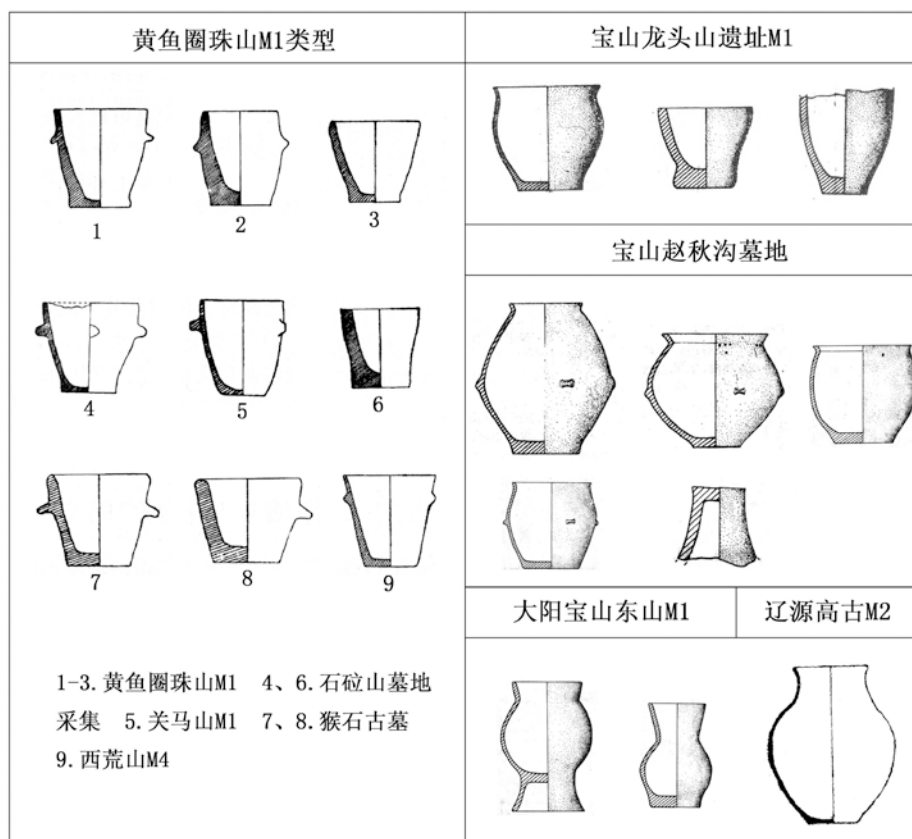
唐淼的研究扩大了此类遗存的内涵，不仅包括上述的几座墓葬，还将辽源高古墓群^[7]，以及东丰赵秋沟墓地、大阳东山墓、大阳林场墓、大阳遗址墓、大阳龙头山墓、大阳三里北山墓、杜家沟墓、驼腰村墓^[8]等盖石墓一并归入此类遗存。同时认为此类遗存以大盖石墓为主，还有少量石棺墓，墓内人骨较多，可辨识者多为多次火葬；随葬陶器多为夹砂灰褐陶、夹砂红褐陶，器型大多较小，手工捏制，应属明器。器型主要包括大口溜肩罐、矮领折腹罐、直领罐、斜腹杯、碗等，基本不见纹饰，多数陶罐肩、腹部饰瘤状小耳或盪耳。不乏青铜器随葬，石器较少，穿孔砾石较有特色，个别墓葬发现少量实用铁器^[9]。

表一

墓葬名	黄鱼圈珠山 M1	石砬山 M1	石砬山 M2	关马山 M1	猴石古墓
所在地	舒兰	九台	九台	九台	公主岭
墓葬形制	土圜石棺，四壁以自然碎山石垒成，棺底铺碎石，顶部未见石材封盖。	竖穴石圜，以不规则的石块垒砌，墓底以石块铺于风化岩石上，原有石板盖顶。	结构与 M1 大体相同，但直接以原生风化岩石为墓底，不见铺石。	墓壁以不规整的石块垒砌，墓底未铺石，2 块石板盖顶。	在竖穴内以不规整石块垒砌墓壁，墓底铺石板，墓顶以 1 块大石板封盖。
墓葬尺寸（米）	2.2×1×0.25	2.35×1.1×1.2	2.15×0.85×1	墓口 3.5×2 墓底 2.3×1.5 深 3.7，呈梯形	2.1×1.6×1.84
葬俗	未见骨架，葬式不明。西南角放置一组小型陶器，据此分析人骨为头北足南。	在被扰乱的填土中发现多件完全或部分炭化的人骨与遗物。	西、北壁有横向往用火燃过的木材，填土中含有火烧过的人碎骨。	经多次埋葬，共含 60 左右人个体。墓内分层摆放骨架，每层骨架间垫有黑褐土。底层见有因火烧而完全炭化的人骨碎片。	经多次埋葬，填土中炭块遗迹与随葬遗物均分层，墓壁边缘所见木炭可能为经火烧的葬具痕迹。

如果说上述第一种见解基本概括了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的特征，但尚存商榷余地的话，那么对于第二种观点，我们则持不同意见。虽然上述墓葬普遍流行火葬与多人、多次葬，以陶制明器随葬的葬俗存在相似点，但墓葬形制与随葬陶器组合的差异非常明显。从墓葬形制上看，黄鱼圈珠山 M1、石砬山 M1、石砬山 M2、关马山 M1 以及猴石古墓均属在竖穴内以石块垒砌四壁，石材盖顶的石棺墓（表一），而西荒山发掘的 7 座墓葬与东丰赵秋沟墓地、大阳东山墓、大阳林场墓、大阳遗址墓、大阳龙头山墓、大阳三里北山墓、杜家沟墓、驼腰村墓等墓葬总体都应属盖石墓（大石盖墓），辽源高古墓群的墓葬则兼有石棺墓与石盖墓两

种墓葬形态。在随葬陶器组合上，乔梁已经指出，如果将外来因素剔除，黄鱼圈珠山 M1 这类遗存表现在陶器上最恒定的因素只有筒腹斜壁附瘤状耳（或无耳，笔者注）的罐、杯一类器物。这类器物在对石砬山上层墓葬遗物的调查中多有采集，在关马山 M1、猴石古墓以及西荒山的几座墓葬中也有发现。相反，在上述位于东丰南部地区的盖石墓中，除龙头山 M1 外出土实例极少。在之前的调查与研究中，我们已经依据随葬陶器的不同，将其分为大阳东山 M1 与其余盖石墓两大类^[10]。前者以壶与罐式豆为基本陶器组合，后者的陶器多为砂质黑褐陶，器表多素面，虽形体较小，多属于明器，但以侈口微折腹的小平底罐发现数量最多，亦最具代表性，表面流行饰桥状小盲耳。可以看出，两类盖石墓无论哪一类的主要陶器组合都与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有较大差异，显然不能混为一谈（图一）。辽源高古墓群仅出土一件陶壶，高度逾 20 厘米，严格讲并不属于明器，其他器类组合亦与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不尽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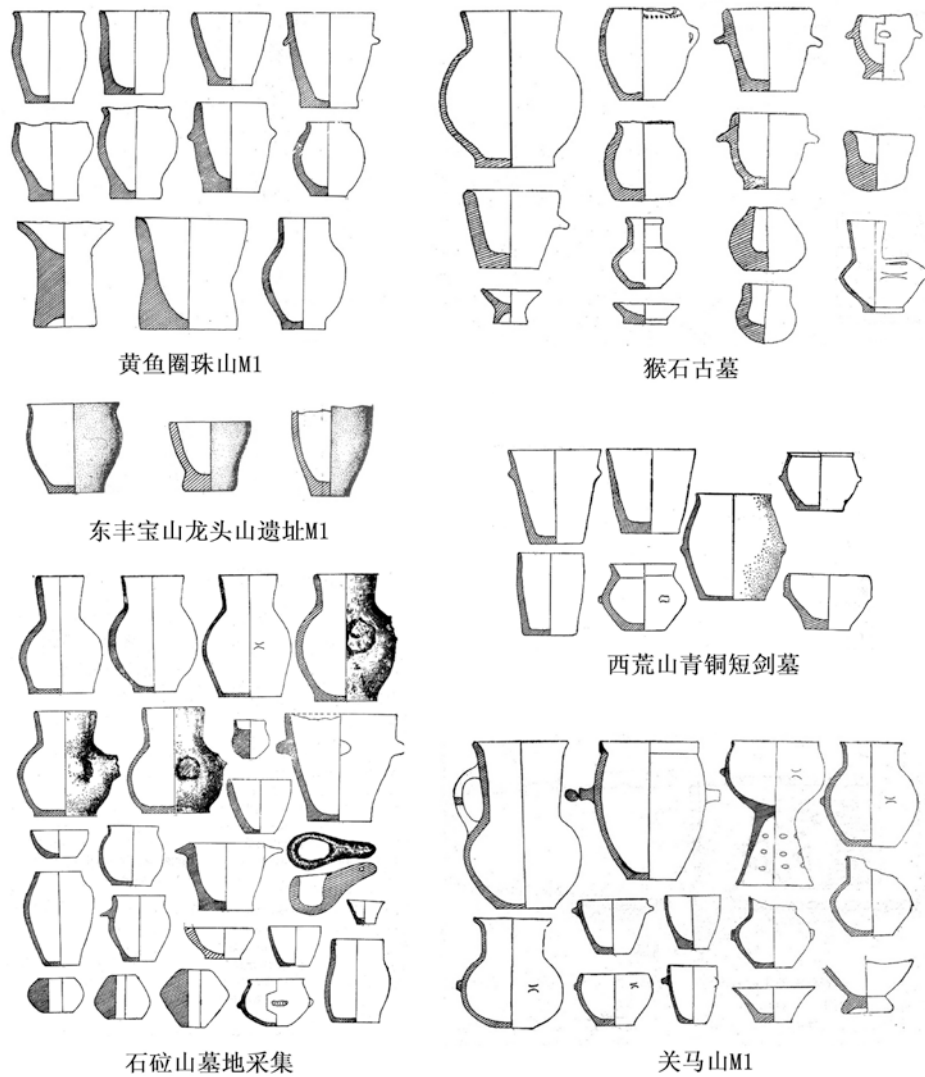
图一 黄鱼圈珠山M1类型陶器与东丰南部盖石墓、辽源高古墓葬出土陶器比较

此外，遗迹的分布与组合亦能作为佐证。含有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文化因素的墓葬分布零散，周边缺乏相关遗址；东丰南部地区第二类盖石墓周围均有遗址分布，有的则见于遗址中，且遗址的内涵比较接近，陶器以壶、罐、豆为基本组合，在现有的发掘与研究成果基础

上，将上述此类盖石墓归入宝山文化^[11]似较为稳妥。

另一方面，目前发现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陶器的墓葬的性质还需要进一步解明（图二）。从这类遗存的典型单位——黄鱼圈珠山 M1 看，该墓出土的陶器共 12 件，器型很小，器高介于 3.8—8.2 厘米之间。胎质粗糙，火候较低，一般手捏成型，胎壁厚重，均应为明器。器型以罐、杯为主，壶、豆各仅 1 件。我们注意到，除陶豆有圈足外，该墓出土的所有陶器底部均内收成假圈足或近似假圈足，那么黄鱼圈 M1 类型遗存陶器的典型特征似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多夹砂褐陶，素面无纹饰；（2）器底均内收（折曲）成假圈足或有假圈足的倾向；（3）以筒腹（带瘤耳）的罐、杯为基本器物组合；（4）器型小，均为手制明器。以此为基准可以发现，九台石砬山墓地出土与采集的陶器约有半数具备上述特征，新出现的盅与杯功能相似，可视为同类器。墓地还出土为数不少的陶壶，形制与东部的西团山文化同类器相近。由于墓地已遭破坏，每座墓出土陶器的形制与组合已不得而知，暂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公主岭猴石古墓出土陶器的形制、组合与石砬山墓地接近，但墓内同时出土的鸭形壶、指甲纹单把罐无疑与松嫩平原、大兴安岭东侧的考古学文化存在一定关联；东丰宝山龙头山 M1 与桦甸西荒山墓的出土陶器除去归属宝山文化，数量较少的鼓腹（折腹）罐外，大多具备前述特征。综上所述，四者均可视作受周邻地区文化影响的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

九台关马山 M1 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该墓共出土陶器 13 件，均为夹砂陶，陶色有褐色与黑色两种，主要器物组合为罐、壶、豆、碗，文化因素来源比较复杂，其中可确认属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的陶器不多，总体特征与黄鱼圈珠山 M1 以及石砬山墓地出土陶器均有较大差异，应属于受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影响的一类遗存。



图二 含黄鱼圈珠山M1类型陶器遗存的陶器组合比较

二、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的年代与演变

乔梁根据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陶器基本组合与形态特征，率先提出此类遗存的来源当在吉长地区东侧的长白山地及其附近地区寻找的观点。赵宾福则将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的 12 种陶器与图们江流域柳庭洞文化晚期同类陶器进行形制上的类比，并指出“尽管有些器壁已经变得较为厚重，有的器耳也已变得有些偏长，但仍然可以看出它们就是柳庭洞晚期文化的子遗”^[12]，进一步肯定了此类遗存来源于柳庭洞晚期文化，对此我们深表赞同。但是，在阐述年代观时，文章在将西团山文化的下限年代判定为战国晚期的基础上，认为在层位上叠压着西团山文化遗存的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的年代应和东部邻区的团结文化相当，属于西汉时期或者更晚一点的可能性较大。同时考虑到柳庭洞文化晚期陶器和珠山 M1 所代表陶

器之间的紧密联系，且器型上看不出有太大的时间间隔，将柳庭洞文化晚期的时代定为与西团山文化晚期平行的战国时期。我们认可该文关于西团山文化晚期与柳庭洞文化晚期的编年结果，但对将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的年代推定为“西汉时期或更晚一些”的见解有不同看法。

首先，从黄鱼圈珠山遗址的层位关系看，遗址共分南、东两区，M1 开口于东区第二层下，叠压叠压三层下开口的 F10。原报告指出，从所获遗物观察、对比，两区的第三、四层大致分别相当，均属于西团山文化遗存，因此东区 F10 的时代大约与开口于南区第三层下的 F2 相差不大。在赵宾福的分期方案中，该房址出土的一件竖耳陶壶属遗址第二段，代表西团山文化中期，年代相当于春秋时期^[13]，这表明珠山 M1 的年代上限理论上至少可到战国。其次，陶器形态上，珠山 M1 类型与柳庭洞文化晚期“紧密联系，且器型上看不出太大时间间隔”。珠山 M1 类型陶器器壁厚度的增加并非群体性现象，若据此认为这是因时代的差异而反映的陶器形态的变化，显然证据不足；珠山 M1 类型部分陶器的瘤耳相对较长，亦不乏瘤耳较短者，瘤耳的形态和时代为两汉时期的团结文化陶器上施加的圆柱状乳突不同，尽管目前有迹象显示出具有较长瘤耳(乳突耳)的陶器在整体时代上要晚于带有较短瘤耳的陶器，但这不足以作为这类遗存的年代与团结文化接近或相当的直接证据。由于珠山 M1 类型陶器均为小型手制明器，尽管不能完全忽视上述两个特点可能具有的时代指征性，但我们更倾向于将视为手制小型陶器时略微出现的形制偏差。

实际上，石砬山墓地、猴石古墓与西荒山青铜短剑墓的发掘报告在结语中都已经根据各自墓葬所在地层的层位关系和墓中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将这些墓葬的年代推定为战国晚期——西汉初，我们也同意这样的观点，此处不再赘言。而黄鱼圈珠山 M1 并未发现有明确时代特征的遗物，考虑到该墓随葬陶器与柳庭洞文化晚期陶器的相似性，目前而言，将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的整体年代推定为战国晚期——西汉初期比较妥当。

从出土遗物的构成看，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各遗存的年代可能还有早晚之分。黄鱼圈珠山 M1 出土器物分陶器与石器两大类，陶器组合以罐、杯居多，另有壶、豆各 1 件，石器则仅有 1 件石镞；石砬山墓地的墓葬出土器物中除陶器、石器外，还出现了铜器，陶器组合中以罐、壶、杯占主体，新出现一定数量的盅。石器种类和数量也有所增加，以砺石最有代表性，其作为磨砺用具此时期一般与铜刀构成一组关联器物组合，因而它的发现亦能反证铜器的出现；猴石古墓中陶器组合以杯、壶、盅为主，罐的数量大大减少，石器中仍有砺石，铜器数量与种类均有较大增长；西荒山墓的陶器中，杯的数量占绝对多数，还有少量罐、钵。石器仍以砺石为代表，器类有所增加，铜器种类与数量又有大幅增长，新出现铁器(表二)。

表二 黄鱼圈 M1 类型遗存出土遗物

墓葬	陶器组合	石器	青铜器	铁器
黄鱼圈珠山 M1	罐、杯、壶、豆	石镞		
石砬山墓群	罐、壶、盅、杯	砺石、石斧、石刀、石管饰	铜扣、铜卡、铜刀	
猴石古墓	杯、壶、盅、罐、豆	砺石、石镞、穿孔石球、石坠饰、玛瑙珠	铜釜、铜刀、铜凿、铜镞、铜泡	
龙头山遗址 M1	罐、盅	加重器	铜剑(?)	
西荒山墓群	杯、罐、钵	砺石、石斧、石刀、穿孔石球、石纺轮、研磨器、石磨盘、石镰、各色石管、琉璃管、玛瑙管、石坠饰	铜剑(十字形柄曲刃剑、触角式柄细身剑)、铜刀、铜镜、铜镞、弹簧形器、铜管、铜指环、铜钏、铜扣、十字形铜器	铁铤、铁镰、铁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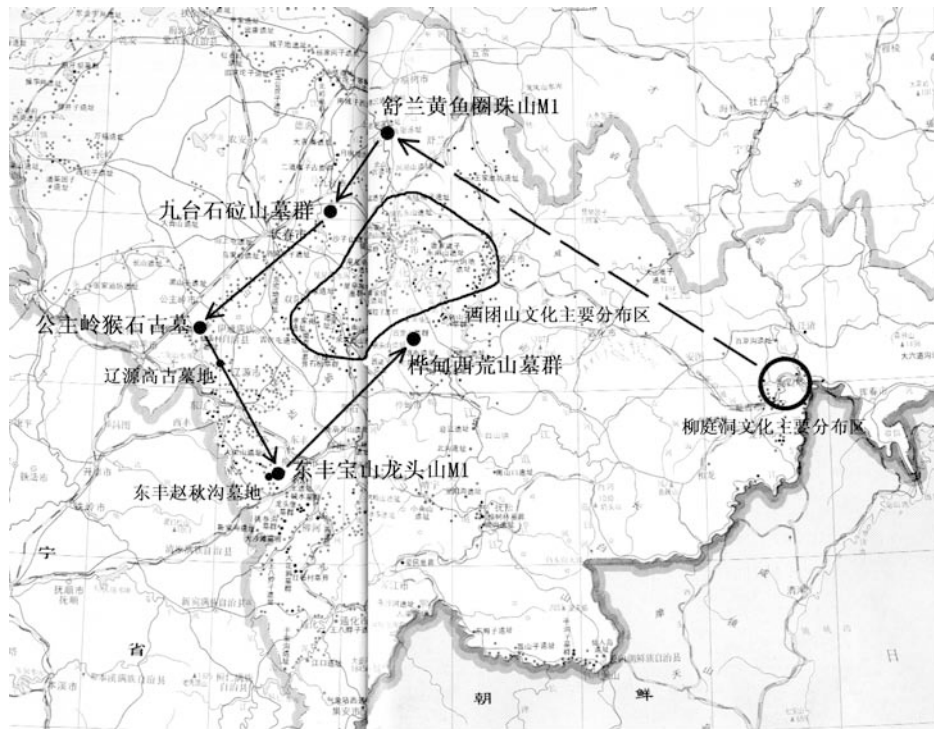
黄鱼圈珠山 M1 无青铜器出土,考虑到其源头柳庭洞文化晚期遗存青铜器的发现亦极为零星,基本可以排除本地冶炼的可能,据此似可推测该墓为此类遗存从柳庭洞文化晚期中分裂出来后不长时间的产物,尚无力冶炼青铜器,也缺乏使用青铜器的经验,因而相对年代最早,可能为战国晚期。铜器的大量出现应当是之后这一类型遗存与周邻文化交流的结果。而西荒山墓群出现铁制工具,显然时代最晚,下限约为西汉初。加之从黄鱼圈珠山 M1 到西荒山墓群,遗物无论从器类还是数量都存在一个明显的增长趋势,我们有理由推测,这类遗存的整体年代序列可能为黄鱼圈珠山 M1→石砬山墓群→猴石古墓→龙头山遗址 M1→西荒山墓群。那么再回过头看就会发现,虽然随着时间推移与分布地点的变化,这一类遗存与相邻文化交流逐渐密切,器物组合中外来因素不断增加,自身陶器组合也经历了罐为主→杯为主的转变^[14],但却始终继承和延续着其以筒腹器为核心的固有文化传统。

三、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所代表人群的动向

虽然目前尚无法确知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在吉长地区的出现是否与柳庭洞文化的消亡有直接的关系,但显然,这类遗存是在柳庭洞文化晚期的终末阶段从其中分裂出来的一支。通过上文的年代学分析,将目前所确认的黄鱼圈 M1 类型遗存的分布地点标注于地图之上,我们可以粗线条地勾勒出这类遗存所代表人群在战国晚期——西汉初期的移动轨迹:从柳庭洞文化晚期分布的中心地带——图们江中下游地区出发,经舒兰、九台、公主岭后,转向东丰,最后顺辉发河而下到达桦甸(图四)。整条路径的选择有显著的不同特征,即移动

过程的前期刻意避开以吉林市为中心的西团山文化核心分布区,选择从其分布区的边缘与薄弱地带通过;后期则直接从宝山文化的中心区穿过,不同的特征实际上代表了这支人群对于文化交流和吸收的态度由保守封闭向积极开放的转变。在这条移动轨迹上,舒兰黄鱼圈→九台石砬山→公主岭猴石的连接相对较为紧凑,而从图们江中下游地区到舒兰黄鱼圈之间则显得距离过大,缺乏中途接续点。由于以往蛟河到延吉一线调查与发掘工作较为薄弱,发现的青铜时代遗迹点不多,此间的移动路线尚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

从公主岭猴石到桦甸西荒山的行进线路倒是有线索可循。在此过程中,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的墓葬形态发生了由石棺墓转变为大石盖墓的重大变化,而在辽源高古墓群发现的石棺墓与大石盖墓共存的现象,则为这一转变提供了良好的注解。辽源高古墓地出土的具有明确时代特征的遗物不多,暂根据 M1 发现的加重器的形制特征将其整体时代推定为战国末西汉初^[15],时间上与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基本相当,其所在位置也成为指示这支人群迁徙路线的重要节点。值得注意的是,西荒山墓群发现的墓葬均有墓道,这种带墓道的大石盖墓在东丰赵秋沟墓地也有发现。该墓地未见石棺墓,而均为大石盖墓,遗物未发现铁器与触角形铜剑,整体时代当不晚于西荒山墓群,因此前者的墓葬形态显然受到后者的影响。结合龙头山 M1 的所在,人群很有可能由公主岭向东南经辽源进入东丰,之后掉头北上前往桦甸。目前尚未发现晚于西荒山墓葬的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分布地点,因此暂将西荒山视作移动的最终目的地。从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看,西荒山墓地的 7 座墓并非同时构筑,存在一定时段的延续,显示出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所代表的人群在此停留时间较之前发现的任何一个遗迹点可能都要更长,石质、铁制农具的发现也更加深了我们对此处是否存在定居或半定居农业的猜测。



图三 黄鱼圈珠山M1遗存所代表人群的动向
(依据吉林省青铜时代遗迹图绘制)

四、结语

以上本文探讨了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的内涵，考察了其时代及演变，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描绘代表此种遗存的人群从柳庭洞文化晚期社会中分裂出来之后的移动路径。客观而言，柳庭洞文化的分布区位于长白山东侧，长期以来缺乏与长白山西侧考古学文化的交流，陶器组合比较简单，青铜器极少，是一支相对落后的考古学文化。这支人群的迁移过程，是落后的考古学文化与先进的考古学文化不断接触，逐渐吸收先进文化因素的过程。在保留其文化内核——筒腹陶器的前提下，这支人群的丧葬方式发生了由石棺墓向大石盖墓的改变，考虑到柳庭洞文化晚期的墓葬形态多为土坑竖穴（封石）墓，不排除其在黄鱼圈珠山 M1 使用的石棺墓就已经深受西团山文化的影响。换言之，这支人群的丧葬方式的变革可能在接触西团山文化所代表的人群之后就已经产生。西荒山墓群墓葬形态与随葬器物的特征则显示出这支遗存可能最终融入了辉发河流域稍晚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同时又与泡子沿类型存在一定的交流。

东北地区大量的发掘与调查结果表明，积石墓、石棺墓、大石盖墓等墓葬形态，火葬、多人多次葬、以陶明器随葬等葬俗，以及青铜器、装饰品等遗物并非某一考古学文化所独有，而是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普遍采用的葬式；另一方面，同一考古学文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存在葬制的演进与变化，不同考古学文化间彼此也互相影响，文化因素互为渗透。因

此，在甄别不同考古学遗存时，仍然要以对陶器、石器各基本要素的考察为前提而展开，以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当时不同人群所代表的各自社会的面貌及其变化的实态。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号：10&ZD085）与吉林大学基本业务费（杰出青年基金）项目（项目号：2011QG006）研究成果

注 释

- [1] 乔梁. 吉长地区西团山文化之后的几种古代遗存[A]. 辽海文物学刊, 1993 (2): 64-70 转 35.
- [2]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吉林舒兰黄鱼圈珠山遗址清理简报[J]. 考古, 1985 (4): 336-348.
- [3]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九台市石砬山、关马山西团山文化墓地[J]. 考古, 1991 (4): 337-345.
- [4] 武保中. 吉林公主岭猴石古墓[J]. 北方文物, 1989 (4): 8-10 转 23.
- [5] 同[1], 下文中出自该论文的观点不再另加注释.
- [6]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吉林省博物馆. 吉林桦甸西荒山屯青铜短剑墓[J]. 东北考古与历史第一辑, 1982: 141-153.
- [7]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省辽源市高古村石棺墓发掘简报[J]. 考古, 1993 (6): 518-523.
- [8] 金旭东. 1987 年吉林东丰南部盖石墓调查与清理[J]. 辽海文物学刊, 1991 (2): 12-22.
- [9] 唐淼. 长白山及其延伸地带青铜时代墓葬研究[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 108.
- [10] 同[8], 以目前情况而言, 将龙头山 M1 出土陶器归入黄鱼圈珠山 M1 类型遗存为宜.
- [11]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东丰 1985 年考古调查[J]. 考古, 1988 (7): 586-587 (图四、五), 590 (图八).
- [12] 赵宾福. 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M]. 科学出版社, 2009: 261-262.
- [13] 赵宾福. 西团山文化分期研究[A]. 考古学报, 2009 (4): 479 图 7.
- [14] 盅与杯的用途相似, 故一并归入杯类, 而柳庭洞文化未见壶类陶器, 壶显然并非此类遗存的固有器类.
- [15] 金旭东. 东辽河流域的若干种古文化遗存[A]. 考古, 1992 (4): 347-356.

More Discussion on The “Huangyujuan Zhushan M1” Culture

Jin Xu-dong Zhao Jun-jie LV Bin

Abstract: This paper re-define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Huangyujuan Zhushan M1” culture, and presumed that the period of this culture was probably between the late Zhanguo Period to the beginning of Han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 the paper described the migration route of the people who representing the culture. The migration revealed the process which a backward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bsorbed advanced culture factors.

Key words: “Huangyujuan Zhushan M1” Culture, pottery with cylinder-shaped belly, the

late Zhanguo Period to the beginning of Han Dynasty, migration